

现代思想史家

李锦全◎著

杨荣国

中山大学出版社



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

李锦全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李锦全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306 - 03494 - 6

I. 现… II. 李… III. 杨荣国 (1907 ~ 1978) —人物研究
IV.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169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责任编辑: 徐镜昌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魏 来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mm × 1168mm 1/32 4.5 印张 1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500 册 定 价: 13.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道路的选择	(1)
一、家道中落，想要读书兴家	(1)
二、社会不公，立志教书育人	(5)
三、时势所迫，转向抗日救国	(9)
第二章 八年抗战的革命征途（上）	(13)
一、“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亡活动	(13)
二、“长沙大火”的劫后重生	(17)
三、革命征途中新的一页	(26)
四、《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的学术价值	(30)
（一）墨子思想研究	(30)
（二）老子思想研究	(37)
（三）杨朱思想研究	(39)
（四）荀子思想研究	(42)
（五）王充思想研究	(45)
第三章 八年抗战的革命征途（下）	(48)
一、白色恐怖下的进步文化人	(48)
二、特殊年代的学术争鸣	(58)
三、先秦孔、墨与明清之际的学术研究	(66)
（一）孔子思想的定位	(66)
（二）墨子思想的定位	(68)

(三) 对孔、墨思想研究的争鸣	(70)
(四) 17 世纪思想史的研究	(72)
 第四章 三年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	(75)
一、反迫害、争民主, 反对独裁政府	(75)
二、讲理论、重实践, 培养革命接班人	(83)
 第五章 建国后 17 年的学术走向	(90)
一、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道路	(90)
二、边破边立, 学术史上自成一家言	(104)
 第六章 “文革”十年的特殊际遇与终极人生	(112)
一、“起”、“落”无常是遇上阴差阳错	(113)
二、是“时”与“命”终结学者人生	(121)
 结 语 徜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133)
 参考书目	(137)
 后 记	(138)

第一章

人生道路的选择

杨荣国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旧中国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由于家道中落、世事不公、朝政腐败、时局动荡等多种背景因素，使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早熟而多变。先是想个人读书上进、照顾小家庭，继而想从事教育、服务社会大众，终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家道中落，想要读书兴家

公元1907年8月1日，杨荣国出生于一个经营图书和纸张文具的商人家庭。关于他的家世，杨姓在中国算得上是个大姓，在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但杨荣国一家，并没有追溯到是哪个名人的后代。据现有资料知道，杨荣国的祖父杨浩然（1842年10月24日~1921年3月13日），原在长沙东乡榔梨市谭杨洲浏阳河上靠摆渡为生。那时国内机动轮船很少，地方上一般河流两岸间的交通，都是用木制小船，靠人力摇橹或划桨来摆渡。摆渡这些小木船，比较有气力的船工一个人就可以操纵，但一天多次往来也是辛苦的力气活，由于摆渡的收入并不多，所以船工过的只能是乡镇间的贫民生活。杨浩然的先世虽不清楚，看来不像是出

身于仕宦家庭或书香世家，这一点大至可以肯定。

杨荣国的父亲杨德怀（1866年12月10日~1914年2月18日），少年时曾跟随父亲摆渡，可能杨浩然认为儿子跟随他干这种营生不会有多大出息，所以在杨德怀十三四岁时，就托人引荐到长沙城中一间经营纸张文具的商店当学徒。由于杨德怀是贫苦劳动家庭出身，少年时就知道世道艰难，所以当上学徒后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在见习工作中尽职尽责，辛勤好学，待人诚恳，在工作中也积累了经商经验。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自己在长沙开设“松祥和”纸张文具店。由于他在商海中的历练和经营得法，为人精明能干，生意逐渐兴旺起来，一度成为比较富厚的商号，于是自行置地购房，全家迁入长沙定居。

杨荣国父亲杨德怀进入不惑之年，经营的商店正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可惜好景不常，到杨荣国7岁时，杨德怀由于积劳成疾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享年才48岁。杨德怀去世时，他的老父杨浩然已经是年过七十的老翁。白头人送黑头人，可以说是杨家的大不幸。杨德怀去世，使家庭失去了顶梁柱，留下老父和妻儿，家庭经济大受影响。杨荣国少年时，就是生活在一起一落家庭变故的环境里。

照一般惯例，杨荣国7岁时开始入学读书。当时中国教育正处在废科举、办学堂的新旧交替时期，民间教育已经开办有中、小学，但旧式的教育依然存在。杨德怀少年时曾随父亲摆渡，后又做商店学徒，虽然经过艰难奋斗，自己开店后经济有所好转，但没有机会上学，文化程度不高，总是有点遗憾。所以在杨荣国7岁时，就把他送进了私塾。

至于杨德怀为什么将儿子送去私塾而不上小学，杨荣国本人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但他的女儿杨淡以在追溯往事回忆中说：“我的祖母杨胡氏（1878年8月30日~1952年12月5日），享年74岁。她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曾是清代秀才。他在父亲的

教导下，读过些书和诗词，还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毛笔字。她的记忆力相当好，我幼年时，常见她背诵诗词，以及向孙辈们讲她曾经读过的旧小说，如《珍珠塔》、《锁麟囊》等。”这个杨胡氏就是杨荣国的母亲，她自身所接受的就是旧的传统文化教育，对新办的小学了解不多，所以儿子送入私塾而不去上小学，她的意见可能起到一定作用。

杨荣国入私塾后所受的仍然是旧式教育，开始读《三字经》等一些启蒙读物，继而背诵《四书》、《五经》等一些儒家经书和唐、宋诗词，他在私塾中读书是相当用功的。

杨荣国在私塾读了7年古书，到他13岁时，社会风气渐开。大概他不满足于整天钻入故纸堆中，开始有学习新知识的诉求，于是告别了启蒙的塾师，提出要投考中学。

杨荣国在私塾中，虽熟读过儒家经书和古诗文，但要考中学还是有些功课缺门，因为他在私塾从来没有学过数学、英语，要想考入中学是不可能的。但回过头来再读小学也办不到，他已经超过读小学的年龄了，时间上也不容许，唯一的办法是补习，希望用最短时间将缺门的课程补上，这就不但要花钱，而且还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杨荣国父亲去世后，家庭是有点困难，但他的母亲还健在，原来的纸张文具店还在继续经营。当时店中有位管事的先生，名叫黄笛初，颇有点数学方面的才能。于是杨荣国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店铺里请黄先生讲解数学。他恭敬地拜师认真学习，很快将小学的数学补上。后来他对人说：“黄先生的数学不错，讲解时逻辑性很强，使我学到不少学习方法。”

至于对英语的补课，杨荣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辅导，只好参加长沙圣经教会办的一所英语补习班。当时有一位与杨荣国一同参加补习、名叫孙伟的同学，后来曾对杨的女儿杨淡以说：“你父亲在班上学习非常用功，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在晒台上朗读英

文，学习极为刻苦、发愤。”由于当时现代数学如几何、三角、代数等多从外国传入，所以有的名词术语多用英文，杨淡以说她父亲晚年，还能流畅地用英语讲述数学公式，可见他早年补习数学、英语两科，确实下了很大功夫。

由念私塾出身的杨荣国，补习完数学、英语两门主课，语文、历史等通过自习，也就顺利地考上中学，而且取得较好成绩完成中学的学业。但他在中学毕业时，家中不想他继续升学，要求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因为他是长子，应该负起家庭的责任。他13岁时进入中学，到毕业按时间计算，应该是已到了十八九岁的成年人，因此家里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如果不去做生意，全家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

当时杨荣国的思想确实很矛盾，他祖父、父亲生前对他寄予厚望，从小就鼓励他要读书上进。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封建时代鼓励人们读书的导向，在20世纪20年代，对杨荣国的家族以至他自己，还会有相当影响。杨荣国顶住压力，要求继续升学。他母亲大概亦不勉强他回家做生意，因为他的祖父、父亲生前想他读书上进，他母亲又何尝没有这种期望，因此见他坚持升学也就同意了。据说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到上海考上群治大学教育系。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个十里洋场的繁华都市，由于对外开放较早，创办的高等学校也比较多。不过当时的上海，没有像北京大学那样的名校，在当时画报见到的，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有的是教会办的，亦有民办的大学。杨荣国入的群治大学并不知名，后来他自己也说出身的不是名牌大学。

杨荣国虽然坚持到上海求学，但是他也知道家庭有经济困难，故此他在上大学期间，为了帮助照顾家庭生活，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兼找工作。他曾在一所教会办的“三一小学”任语

文教师；还曾与同学贝允昕等人办有“湘澜女学”，在校中任语文教员，另外亦找些临时兼职。正是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学习与工作相辅而行，到1929年杨荣国在群治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

杨荣国在家道中落后，顶住压力考上中学、大学，就是想通过读书上进的路子来重振家声，这是他在青少年时最初想走的人生道路。

二、社会不公，立志教书育人

杨荣国的少年时期，正处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时代，一般平民百姓，特别是乡间农民，过的都是贫困的生活。前面说到，他的祖父杨浩然，是一位在乡间摆渡的个体劳动者，生活不能摆脱贫困。杨荣国年纪小的时候也去过老家东乡谭杨洲，亲眼看到农村的贫穷破败。虽然这段期间，由于他父亲生意经营得法，家庭经济好转，生活比较富裕，但乡间的穷亲友，一样依然困难。所以当农村遇到灾荒，那些穷亲友有困难时，就进城来向他父母借钱。他的父亲由于早期贫困的经历，对穷人颇为同情；他的母亲杨胡氏，待人特别厚道，遇到经济困难的亲友，有时连头上戴着的玉簪子，手上戴的金戒指，也取下变卖来帮助人。当然在他父亲去世后，这种情况难以再见，到他去上海考大学时，反而要亲友的帮助了。

这种社会现象使他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祖父、父亲的影响，他祖父没有读过书，深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痛苦，落得一生穷困；父亲少年时当学徒出身，也经历过种种困难。另一方面，农村贫穷落后，与人们知识水平的低下，缺乏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也是有很大关系。他吸取这些方面的教训，肩负着乃祖乃父的信托，读书上进，誓要做个有高等知识文化的人才。不过他上大学念的是教育系，这里就有“为己”与“为人”的思

想在起作用。所以说“为己”，他是从家中祖父、父亲以至乡中亲友的遭遇吸取教训，没有文化知识的人难以走出贫穷，因而读书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自己发展前途打算。而“为人”，就是将来当老师可以教育别人，也是帮助别人脱贫的好办法。他上大学学的是教育，自认为“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当时有的知识分子，曾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他当时可能也有这种思想。

杨荣国在上海读大学时据说不大过问政治，没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只想毕业后找份好工作，为的是希望能多点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同时从事教育工作，服务社会，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亦是为国家作出一点贡献。

杨荣国所以立志学教育，并想将来做个教育工作者，在“为人”方面，还想用普及教育的办法，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以免闹愚昧无知的笑话。他曾对他女儿讲过一件小事：“自己小时，在长沙街上常有背着大喇叭留声机的小贩，吆喝着：‘听洋人打哈哈，两个铜板一次……’洋人打哈哈有什么不同，也值得听吗？那不就是将笑声收入去，又放出来嘛。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思考。”他思考什么呢？一方面感到市民百姓没有科学知识，不懂得当时留声机的功能。更可笑又复可怜的是，那时民风闭塞，街上出现一个外国人即所谓洋人，就有人围观和跟着走，现在留声机内打哈哈的却说是洋人，虽不见其人而闻其声，所以觉得新奇了，这种崇洋的现象不是愚昧又是什么？由此他也就思考到要提高群众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要了。

社会、家庭及学校教育对杨荣国的思想影响，使他比较早认识到民间疾苦和社会的不公平。上面谈到，他小时入读私塾除熟习儒家经典外，还读了不少古代诗词。后来他在一篇名为《大众诗人白居易》的文章的“前言”中，曾追述他小时的感受：

我小时候读诗，就有一个这样的癖性：关于那些写民间

疾苦的诗，我就喜欢读；而关于那些言之无物的，只是供人赏玩的诗，我就不喜欢读。比如李商隐他们的所谓锦瑟诗和杨亿他们之所谓西崑体诗，我不是没有读过，并且还读得不少，可是现在若有人叫我背诵他们的诗，我就一首都背诵不出。原因就是他们的诗只会堆砌词藻，没有什么内容，所以不大容易为人所记忆。至于小的时候所以还能背诵，那是因为塾师的威严之下，勉强读得成诵的，并没有怎么把它记牢固。

那时最感兴趣的，就是杜甫和白居易他们的诗。

杜甫，塾师说他是“诗圣”，《幼学》也是这样介绍过，“诗称李杜”。可是我倒不是因为塾师的称说和《幼学》的介绍才喜欢读他的诗；事实上是由于他的诗能反映时代，能将当时社会的实况——政治的纷乱和民间的疾苦忠实地写了出来。如他的《石壕吏》之类，就深深地感动了我，就使我知道因为当时政治的腐败，弄得兵役制度也糟到不可收拾。

但我喜欢白居易，比喜欢杜甫还要更胜一筹。原因就是他的诗，除了更能反映社会的实况，更能将当时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平描画出来以外，他比杜甫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诗能大众化，人人读了容易懂。

杨荣国追述大概讲的是实话，他欢喜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特别是那些能揭露当时人民痛苦和社会不平的作品，可以说是终生不变。据他女儿杨淡以回忆，说她父亲有一个习惯——清晨起床常背诵唐诗，而且是用他那地地道道的长沙语调来背，那声抑扬顿挫，简直就是唱，家乡味很浓。

那么成为他清晨习惯唱的又是那些唐诗呢？原来就是杜甫的《石壕吏》和白居易的《卖炭翁》：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郾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是杜甫写的《石壕吏》诗。讲作者有一天晚上投宿在石壕村中见到的景象，碰到官差到他投宿的家中捉人。当时那家中的老翁爬墙出外躲避，由老妇人出门来应付。原来官差是来拉人当兵。他听到老妇人向官差诉说：“家中三个男孩已经到郾城守卫当兵，有一个儿子来信说，有两个儿子最近打仗身亡。现在家中没有别人，只有个吃奶的孙子，他的母亲还在家中，但穷到出门也穿不上一条像样的裙子。我老婆子虽然力气差些，但可以跟官差回去，应急时到河阳的军中服役，还可以作个炊事兵。”夜深讲话声音慢慢听不清，似乎在吞声饮泣。老妇人跟着官差走了，爬墙避难的老翁又回来。投宿的住客天明起程时，只有单独向这位老翁告别。

杜甫这里写的是白描诗，正如有本高校“中国文学史”教材中的评价说：这是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只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但杨荣国当时小小年纪，在私塾中读各家的诗词，为什么这些写民间疾苦的诗篇，对他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并且长效不衰？他女儿说他这种认识是与他家庭与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他对家庭情况的变化，老家亲友的穷困，地方官吏欺凌百姓，以至社会不公等种种现象。从所见民间疾苦，对应杜甫、白居易的诗作，随着人年龄的长大，更加有深切的感受。

另外他在上海上学这几年，十里洋场的繁华，只是帝国主义

者、官僚买办，以及大资产阶级等高等华人的天下；一般平民百姓，却受尽欺凌和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公园门口挂着牌子，公然歧视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端羞辱。对此杨荣国是深表不满的，但他当时还没有革命的要求。他上大学时不大关心政治，只想个人读书上进将来找到好工作照顾家庭；不过由于不满社会不公，也有同情和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面。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是由于普罗大众缺乏文化知识，这是造成贫穷落后的原因，而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和竞争能力，所以当时亦有学者提出教育救国的理念，而杨荣国选读教育系亦有将来当教师服务社会的意愿，也可以说这个时期他立志想选择的人生道路。

三、时势所迫，转向抗日救国

1929年，杨荣国从上海群治大学毕业，开始要正式投身社会找工作。前面说过，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没有有力的家庭背景和各种上层的社会关系，他这个土包子穷学生，毕业后在当地是难以立足的。同时他在长沙的家庭也需要照顾，于是他还是回到长沙家中。

杨荣国走入社会，开始时还抱着很高的热情和期望。他入大学所以选读教育，原本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培养人有文化知识；可以改变祖国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曾经立志教育为人。但是在现实面前他失望了。因为那年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即使在大学毕业，无论在上海还是回到长沙，一样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下面是他后来对女儿说的一番话：

那个时候，想找一份工作真难，去公办的中学当教师，需要有门路，家中有人做官的，家庭是富商的，才有办法，而我只能在私立中学转来转去，工资低，讲授的课程还不能

任你选。

他还告诉女儿说：

那时，不论在大学、中学还是小学当老师，学校当局只下一年的聘书，如果在第二个学期结束前未获得新聘书，就算是被解聘了，自己得设法另谋出路。即使在受聘期间，还可能有什么意外的事儿。如与校方有特殊关系的人来了，或你的事、病假稍长等等，都有可能被解聘，那怕你教书很认真负责，深受学生欢迎，也无济于事。

上面他对女儿说的两段话，完全是他亲身经历的实情。他毕业后回到长沙这几年，就先后辗转在“协匀”、“船山”、“日新”、“孔道”等私立中学任教，担任过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物理、体育等课程的教师。可以说，除了音乐、绘画课外，中学的各门课程他都教过。即使这样，他这个几乎能够胜任中学所有课程的全能教师，有时免不了仍会失业。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找门路去当家庭教师，他在担任家教时就曾辅导过数学和英语。

杨荣国进入世途虽然遇到那些挫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他写过这样的话：“我自己想，自己应该在困难的环境中打出一条路来。于是便努力钻研业务，向学习好的同学看齐。”他在逆境中仍旧勤奋好学，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虽然找工作仍然困难，但他这种不问收获，只重耕耘的精神，还是值得人们钦佩。不过具备了这种上进精神，在现实中仍无用武之地，怪不得与他相好的同学，半玩笑地送给他一个绰号“书呆子”了。

然而，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对中国人民越来越迫近了，杨荣国的思想，随之也有所变化。自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就开始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并且步步进迫。但到蒋介石掌权时，为着对内围剿共产党，不惜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还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在这种情

况下，长沙这个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市民再也忍耐不住了，早在大革命前后，当地的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就组织过“雪耻会”、“抗日会”。杨荣国和他的同学们就参加过抵制日货、反对向帝国主义投降等活动。杨荣国当时还是个学生，对群众反帝斗争的政治目的还不是很明确，但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欺凌，人民需要进行反帝斗争，思想上多少会留下这种印象。

杨荣国大学毕业后回到长沙，如前所述，他虽然表现出“书呆子”的一面，但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寇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东北大片土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形势更加迫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全国各地组织了“救国会”，湖南长沙的“救国会”也跟着成立。杨荣国当时仍在努力钻研业务，找工作养活家庭，但在形势迫使下，也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1935年正式加入了“救国会”。

当时各地成立“救国会”，因用“救国”为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表面上不能公开反对，但其实他推行对日帝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干的是卖国行为，而人民群众却要“救国”，不是和他对着干吗？因此在这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变成了卖国有理而救国有罪，在国统区成为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长沙，参加“救国会”组织或是进行活动是有风险的。杨荣国后来追述过这方面的情况：

“救国会”所领导的“一九三六剧社”在长沙青年会演救亡戏剧，预备开演那天下午，陈杏庄（特务）走来，气势汹汹，说要抓人。要抓刘乐扬，说刘乐扬是他们的人。我们得知此消息，便暗中通知刘乐扬溜走。后来刘乐扬通过李尹克，逃到广西去了。当晚刘乐扬所演的角色，另找人代替，戏才得演出。

有一次，陈杏庄请客，把李仲融、廖若平、孙伟和我等

五六人都请去了，在吃饭当中，陈杏庄谈到抗日：并非不要抗日，不过时候未到——他这番话即蒋介石的“牺牲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的翻板。于是李仲融和人们相继谈到东北的抗战及上海蔡廷楷等的抗战，不是早在抵抗了吗！并且他们打得都不错！谈至此，他语噎，随即便转到别的话题了。

1936年，我们搞“救国会”，当时“救国会”所办的《湘流》三日刊，是由章东岩（章士钊的侄儿，当时是省二中老师，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任社长。是那年的下半年，有一个晚上，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室（后得知，陈杏庄是特务室主任）派特务把章东岩抓去了。至第二天，陈杏庄把李仲融找去，李仲融与他争论了一夜，次日清晨，才把李仲融放回。但以后再也听不到章东岩的消息了。

陈杏庄小时候，曾与李仲融和我同过学，他原名叫陈开泰。他家是开茶楼的，大革命前搞“雪耻会”、“反日会”，他都参加过。以后我们才知道他在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共产党，但在“马日事变”后叛变自首。1951年见报载，他已被镇压。

以上是杨荣国追述当年参与“救国会”活动的片断情况，只是演一些救亡戏剧，或是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国民党的特务就要来抓人。刘乐扬得知消息而逃走，章东岩被抓后也再无消息，可能被杀害了。搞救国活动没有丧命于敌人的屠刀，却被自己国家的政府抓捕迫害，甚至付出生命，这就不能不使人发出人间何世的慨愤了。

杨荣国原本想通过读书，靠个人奋斗，使自己成为知识分子，以此振兴家庭，同时也为社会大众服务，但他大学毕业回到长沙找工作，接触到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人士，逐渐地，他也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